

# 法顯研究之六：求法高僧在北天竺攀岩走壁的绝技： 論梵文 śaṅkupatha 與法顯的“傍梯” 以及曇無竭和玄奘的“杙”

[ 德 ] Haiyan Hu-von Hinüber ( 胡海燕 )

德國埃爾富特大學

**摘 要：**在穿越中亞大沙漠和蔥嶺之後，法顯一行首次度過了印度河。根據《佛國記》的記載，在河谷的懸崖峭壁上，“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這段描述雖然不長，但直至2010年，學界關於“傍梯”一詞的詮釋始終模糊不清，甚至有誤。2010年和2011年，筆者先後用德文和英文發表了兩篇關於法顯《佛國記》的論文。通過考證梵文語法的早期注疏以及巴爾胡特佛塔的浮雕，敝人提出“傍梯”應該是印度北部山區的 śaṅkupatha（楔子路），《漢書》稱為“懸度”。2017年，臺灣圓光佛學研究所將筆者的上述二文加上另外三篇英語發表的法顯論文收集成冊，題為“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

作為“法顯研究之六”，本文旨在為2011年討論過的“傍梯”增補佐證。所補充的資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1）兩位西行高僧對法顯“傍梯”的相應稱謂：《高僧傳》記錄曇無竭在印度河谷使用“杙”攀岩、玄奘在《大唐西域記》描述自己“椽杙躡蹬”同一懸崖。（2）中國史籍和佛教文獻中記載的“懸度”，如《釋迦方志》記錄孝明帝派蔡愔等“從雪山南頭懸度道”赴天竺覓佛像求釋教、《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記載惠生穿過蔥嶺後“鐵鎖懸度”抵達烏場國，等等。（3）近代有兩位學者親臨其境並留下記述：1942年英籍考古學家

M. A. Stein 發表了 “From Swat to the Gorges of the Indus”，1987 年德籍民俗學家 K. Jettmar 發表其文 “The ‘Suspended Crossing’: Where and Why?”，均在此補充。

**關鍵詞：**法顯、傍梯、śankupatha、曇無竭（法勇）、杙、玄奘、椽杙、傍杙

## 一、引言：法顯之“傍梯”再考

在穿越中亞大沙漠和蔥嶺之後，法顯和慧景、道整和慧應一行四人在陀歷國和烏菴國之間首次渡過了印度河。根據史料和法顯的記述，度過蔥嶺便進入北天竺了，“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sup>1</sup>。從這裡，法顯一行沿著蔥嶺南麓向西南方向行走了十五天，途中道路異常艱阻。這一帶就是古今聞名的達麗川（Darel Valley），它位於今天巴基斯坦東北部的山區，在古代屬於罽賓國的範圍（今阿富汗東南、巴基斯坦北部以及克什米爾西北部）<sup>2</sup>，是當時進入北天竺的必經之路。自法顯之後，天竺與漢地的佛教僧人更是頻繁來往於此（見本文第三節和第五節）。

在到達印度河彼岸的烏菴國之前，《佛國記》裡說，在此岸的懸崖峭壁上“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sup>3</sup>。經過多視角

<sup>1</sup> 《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 2085 號，第 51 冊，第 857 頁下欄第 28 行至第 29 行。

<sup>2</sup> 關於該地區的最新研究可參考意大利駐巴基斯坦考古隊 (ACT Project) 的一系列發表，例如 Meister and Olivieri, “Gumbat Balo-Kale (Swat): Architectural Analysis, Conservation, and Excavation (2011-2012)”。

<sup>3</sup> 同上，第 858 頁上欄第 7 行至第 8 行。

的考證，筆者 2011 年（法顯研究之二）<sup>4</sup> 曾提出，“榜梯”一詞應該就是北天竺山區經常被使用的“楔子路”，梵文稱 śaṅkupatha（見第二節）。śaṅku 的意思是“楔子”或“錐子”，古漢語稱“杙”。其一端被削尖，可插入地裡栓系牲畜。在印度古代，śaṅku 也可以用作武器或劈割的工具。patha 意為“路”。作為複合詞，śaṅkupatha 意指使用楔子纔能通過的路。śaṅku 是以 90 度的角度把帶尖的一端打入懸崖的壁面，而暴露在外的一截楔子則可安足。攀岩人把腳踏在楔子上時，下面是懸空的，全身重量（包括背負）祇靠楔子支撐。

這種特殊的山路非同一般，它即需要相應的技能和經驗，也需要足夠的體力和膽魄。在交通和科技發達的現代，這種穿越方式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現如今也最多被職業登山運動員青睞。但在古代，巧奪天工的 śaṅkupatha 不失為一種即經濟又便捷的交通和運輸手段。本文旨在為 2011 年的論點增補一些新的旁證資料，側重以下三點：

法顯歸國八年後，曇無竭（法勇）“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sup>5</sup>，於是重旅顯師求法歷程。慧皎在《高僧傳》裡記錄了曇無竭等在北天竺攀岩走壁的驚險絕技：“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攀”<sup>6</sup>（見第三節）。

五世紀初，與法顯和曇無竭同時代的梵語詩人哈利巴陀

<sup>4</sup> 見 Haiyan Hu-von Hinüber, “Faxian’s (342-423) Perception of India—Some 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 Foguoji,”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0 XI* (2011): 223-247. 此篇論文的中譯本見許尤娜譯，《法顯對天竺的認知：〈佛國記〉一些新詮釋》，發表在《圓光學報》第二十三期 2014 年，第 181-223 頁。英文原文以及中譯本均再版於《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the Chinese Buddhist Monk Faxian (approx. 342-423)*. 雙語版 / Bilingual Edition. Edited by The Yuan 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圓光佛學研究所, Taiwan, 2017, pp. 85-183.

<sup>5</sup> 《高僧傳》卷三，《大正藏》第 2059 號，第 50 冊，第 338 頁中欄第 28 行。

<sup>6</sup> 同上，第 338 頁下欄第 10 行至第 11 行。

Haribhaṭṭa 藉《本生鬘》(Jātakamālā) 為題撰寫了佛祖生平。這位生於北天竺的詩人描述了善財王子如何使用 śaṅku (楔子) 攀登岩壁。這段梵文詩句可以逐字逐句地應對上曇無竭傳(見第四節)。

繼法顯和曇無竭兩百年之後,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記》裡的也提到“椽杙”攀岩,並且使用了與“傍梯”字面上更為接近的術語“傍杙”(見第五節)。

通過對比可以說明,曇無竭和玄奘提到的“杙”或“傍杙”與法顯所說的“傍梯”同屬一物,它們是梵文 śaṅkupatha 的最早漢譯。

2017年3月,五臺山佛教國際研究院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單位共同在山西襄垣舉辦了以法顯為專題的國際研討會,再次將高僧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本文源於此次會議的交流報告並增補了一些資料。在結尾部分(第六節),筆者將與同仁分享最近幾年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

## 二、多視角探討梵文術語 śaṅkupatha (楔子路)

為了更好地與曇無竭和玄奘的記錄加以比對,下面先從《佛國記》原文、中國史籍、梵文語法、印度藝術四個方面歸納 2011 年論文要點並給予補充。<sup>7</sup>

### (一)《佛國記》相關段落的原文

至 2011 年,對下文中的“傍梯”一詞,眾多《佛國記》的研究始終含糊其辭、模稜兩可,大部分將其詮釋為在懸崖壁面上採石修路後鋪設的“石階梯”。

<sup>7</sup> 第二節的文獻出處請參閱 Hu-von Hinüber, “Faxian’s (342-423) Perception of India” (前揭)。恕在此不贅。

度嶺已到北天竺。……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嶮、崖岸嶮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sup>8</sup>

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誤解的原因是很多人難以理解法顯“鑿石通路”的具體所指。有些學者對此一帶而過不予關注，也有日本學者乾脆不予翻譯，直接引用原文的漢字。筆者認為，“傍梯”雖僅兩字，卻暗藏玄機，留給後世諸多文化信息，深究下去，問題並不簡單，原因有二。

在尚無爆破技術的時代，在懸崖峭壁上鑿石鋪梯的工程量之大是難以想象的。況且，與北天竺相關的古代文獻中並沒有這類工程的記載。所以法顯說的“傍梯”不應該是在懸崖上開鑿的石頭階梯。傍梯一詞裡的“梯”字原指“安足處”，或曰“腳蹬子”，而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階梯或梯子。

法顯歷經六年方纔抵達中天竺，走過的驚險之路可謂數不勝數，而《佛國記》又以簡要精練而著稱，全書祇在此處對一種路做了描述。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假如“傍梯”不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通道，法顯絕不會刻意地費筆墨去描寫它。在“凡度七百”四個字裡，法顯更是充分流露了度梯如年的那種膽戰心驚，以致他多年後回憶起來仍舊“心動汗流”。<sup>9</sup>

<sup>8</sup> 《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2085號，第51冊，第857頁下欄第28行至第858頁上欄第10行。

<sup>9</sup> 見《佛國記》跋文：“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必死之地，以達萬一之冀。”《高

## （二）中國史籍和佛教文獻中記載的“懸度”

關於古罽賓國境內的“懸度”，在史料中多有記載。在上述《佛國記》的引文裡法顯強調，無論是西漢武帝的遣使張騫（前 164–114 年）還是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7 年）被西域都護班超派往大秦的甘英，都不曾親臨蔥嶺南麓的達麗川峽谷。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最早經達麗川“懸度”之道進入北天竺的應該是東漢永平三年（60 年）由孝明帝派遣的蔡愔一行。在《釋迦方志》裡，與玄奘同時代的道宣（596–667）記錄了顯宗孝明皇帝夜夢金人之後，派遣蔡愔等“從雪山南頭懸度道”赴天竺覓佛像求釋教，並於永平十年（67 年）攜迦葉摩騰（Kāśyapa Mātanga）和竺法蘭（Dharmaratna）等返抵洛陽，明帝為建白馬寺：

後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夜夢金人，身長丈餘，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帝問群臣，通人傅毅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乃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從雪山南頭懸度道，入到天竺，圖其形像尋訪佛法。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還，尋舊路而屆雒陽。<sup>10</sup>

班固（32–92）在《漢書》西域傳第六十六上罽賓國一章裡，也描述了令人望而生怯的“懸度”：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

僧法顯傳》，《大正藏》第 2085 號，第 51 冊，第 866 頁中欄第 27 行至第 29 行。

<sup>10</sup> 《釋迦方志》卷二，《大正藏》第 2088 號，第 51 冊，第 969 頁上欄第 14 行至第 20 行。

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  
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sup>11</sup>

道宣還記錄了魏太武帝末年（452年），沙門道藥從中亞的疎勒古道入經懸度，抵達了中天竺恆河流域的僧伽施國（Samkāśya），之後又按原路返回：

後魏太武末年，沙門道藥從疎勒道入經懸度到僧伽施國。及返還尋故道，著傳一卷。<sup>12</sup>

至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年），胡太后派遣洛陽崇立寺比丘惠生與敦煌人宋雲往西域取經。根據《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的記載，惠生一行也是在穿出蔥嶺之後，成功地翻越了“懸度”，然後抵達烏場國。

漸出蔥嶺，磽角危峻，人馬僅通。鐵鎖懸度，下不見底。十二月初旬入烏場國，北接蔥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原田膾膾，民物殷阜。<sup>13</sup>

<sup>11</sup> 《漢書》卷十二，香港：中華書局，1970年，第3887頁。該段英譯文見A.F.P. Hulswé and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 23* (Leiden: E.J. Brill, 1979), 110ff.

<sup>12</sup> 《釋迦方志》卷二，《大正藏》第2088號，第51冊，第969頁下欄第4行至第6行。道宣在《廣弘明集》還糾正說“懸度”與“賢豆”、“身毒”、“天毒”等概念不應混淆：“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廣弘明集》卷七，《大正藏》第2103號，第52冊，第129頁中欄第5行至第6行。誤會之所以產生，除了發音近似，可能也在於“懸度”是度過“身毒”河並進入“身毒”國的必經之路。

<sup>13</sup> 《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大正藏》第2086號，第51冊，第867頁上欄第14行至第17行。在六世紀中葉成書的《洛陽伽藍記》裡，楊銜之在卷五也記錄了宋雲和惠生的這段取經之路：“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鑿鎖為橋，縣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蔥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洛陽伽藍記》卷五，《大正藏》第2092號，第51冊，第

從地理方位來看，惠生依循的路線，與東漢的蔡愔（60–67年往返）以及東晉的法顯（399–405年往天竺）和曇無竭（420年發跡）是一致的。兩百多年之後，玄奘走的也是這條路。根據各種史料，所謂“懸度”包括達麗川各種危險的通道，<sup>14</sup>其中難度最大的莫過於楔子路或曰“杙道”。正如玄奘概括的“或覆繩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躄”（見第五節）。<sup>15</sup>

### （三）梵文語法及注釋中有關 śāṅkupatha（楔子路）的記載

關於達麗川的楔子路，法顯說多虧“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與此相符合，曇無竭也說“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既然是前人鋪設的，那麼我們不妨在五世紀之前的印度文獻裡找一找 śāṅkupatha 的記錄。

相比中國，古代印度的歷史文獻學發祥得比較晚（10世紀前後），而且帶有較大的地區局限性。因此歷史學界往往存在誤區，認為印度沒有史料學，其實不然。儘管在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前3世紀）之前印度還沒有文字，但藉助雅利安人獨一無二的口頭流傳技巧，大量吠陀文獻得以從公元前11世紀流傳至今，甚至一字一音分毫無誤。同樣屬於這類口傳遺產的還有公元前5世紀的佛教學說，以及

---

1019 頁下欄第 14 行至第 19 行。

<sup>14</sup> 19世紀中葉，英殖民時期的考古學家康寧漢（A. Cunningham）、20世紀初的英籍印度及中亞學者斯坦因（A. Stein）、以及20世紀晚期德國民俗學家 K. Jettmar 和日本學人土古遙子等都先後對該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並發表過勘測報告。

<sup>15</sup> 玄奘弟子慧立在撰寫於688年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裡，也提到奘師跨越懸度的旅程：“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陵溪之險，不復為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大正藏》第2053號，第50冊，第226頁上欄第6行至第9行。又：“貞觀中年，身毒歸化。越熱阪而頒朔，跨懸度以輸踪。文軌既同，道路無擁。沙門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驅奈苑，至於天竺。”（同上第258頁中欄第19行至第22行）。

屬於同時代的梵文語法系統。作為另外一種形態的文化，印度的諸多隗寶都是通過口頭流傳保留下來的。

śaṅkupatha 這個術語在公元前 3 世紀和 2 世紀就先後被兩位印度語法學家解釋過。印度的古典梵文語法早已自成體系，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經→註→疏三位一體的傳承結構。下面先把相關的來龍去脈簡要介紹一下，主要涉及到三部語法著作，它們的關係是承前繼後的：

印度梵文語法的鼻祖叫波你尼 (Pāṇini)。他的生存年代約為公元前 5-4 世紀。其語法叫《八章書》(Aṣṭādhyāyī)，亦稱《波你尼經》(Pāṇinisūtra)。<sup>16</sup>

約公元前 3 世紀，另一位語法學家伽帖衍那 (Kātyāyana) 為《波你尼經》做了補注，梵文稱之 vārttika。

上述兩部語法書均無單行本流傳下來，而是保存在公元前 2 世紀成書的《語法大疏》(Vyākaraṇa-Mahābhāṣyā) 裡，簡稱《大疏》，其作者叫帕曇伽利 (Patañjali)。

《波你尼經》裡的 sūtra 一詞特指古代印度的一種專門的文體，即提綱挈領、簡明扼要的“經典”<sup>17</sup>。不到四千句《波你尼經》全面涵蓋了複雜的梵文語法。對於我們要討論的 śaṅkupatha (楔子路) 來說，波你尼本人的出生地也值得關注，根據玄奘的記述，他出生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 Śalatura 山區，這裡正是西行求法僧人的必經之路。

<sup>16</sup> 詳見金克木《梵語語法〈波你尼經〉概述》，收於金克木著《梵佛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89 頁。

<sup>17</sup> 佛經所謂的“經”本身也具有這個含義，早期稱為 sūtra 的經文均體現著固定而獨特的體裁和內容。

波你尼《八章書》的第五章第一節第七十七句是：uttarapathenāhṛtam ca。中文的意思是：“‘通過北國之道運來的貨’這個詞也可以照此類推”。這句精悍的語法條例解釋的是一種名詞的構詞法：（a）梵文具格“通過北國之道”加名詞“運來的貨”所表達的意思也可以直接用名詞 *uttarapathikam*（北國之道運來的貨）來表達，前提是將詞首的一級元音 *u* 變為三級元音 (*Vṛtti*) *au*，同時在詞尾加上表示名詞的後綴 *ika*，<sup>18</sup> 由此構成一個中性名詞。（b）與此相同，“通過北國之道的行人”的意思也可以直接用名詞 *uttarapathikaḥ* 來表達，前提也是將詞首的一級元音 *u* 變為三級元音 *au*，同時在詞尾加上表示名詞的後綴 *ika*，由此構成一個陽性名詞。

根據《大疏》所載，晚於波你尼約一百年的語法注釋家伽帖衍那用兩種路的具體雙數補釋了波你尼所說的“通過北國之道” *uttarapathena*：<sup>19</sup> *ajapathaśaṅkupathābhyāṃ ca*。中文意思是：“‘通過山羊路和楔子路兩種路（運來的貨）’這兩個詞也可以照此類推”。伽帖衍那例舉的“山羊路” *ajapatha*<sup>20</sup> 和“楔子路” *śaṅkupathā* 都是北天竺山地獨有的通道。到了公元前2世紀，集大成的語法注釋家帕曇伽利在《大疏》裡，又對伽帖衍那上述的例句給予了進一步的註疏，使其更為易懂：

*ajapathaśaṅkupathābhyāṃ ceti vaktavyam/*

*ajapathena gacchaty ājapathikaḥ/ ajapathenāhṛtam ājapathikam/*

<sup>18</sup> 這裡涉及的名詞構詞法在傳統梵文語法系統裡被稱為 *thañ*，參見 Otto Böhtlingk, *Pāṇini's Grammar: herausgegeben, übersetzt, erläutert und mit verschiedenen Indices versehen*, Leipzig: H. Haessel, 1887, p. 166b.

<sup>19</sup> 關於“北國之路” *uttharapatha* 亦參見 Neelis 2011:183f.

<sup>20</sup> 關於“山羊路”和“木管路” *vetrapatha*，筆者在2011年的文章（前揭）裡做過介紹，在此不贅。

śāṅkupathena gacchati śāṅkupathikaḥ/ śāṅkupathenāhṛtaṃ  
śāṅkupathikam/

[ 中譯文 ] ( 這裡 ) 需要講解 ( 伽帖衍那注釋 ) 的是：  
“ ‘ 通過山羊路和楔子路兩種路 ( 運來的貨 ) ’ 這兩個詞  
也可以照此類推” 。

“ 通過山羊路行走 ” 可構成 ājapathikaḥ [ 譯者注：陽性名詞 “ 走  
山羊路的人 ” 。語法規則如上：將詞首的二級元音 ( Guṇa ) a 變為  
三級元音 ā，同時在詞尾加上名詞後綴 ika ] ；

“ 通過山羊路運來的貨 ” 可構成 ājapathikam [ 譯者注：中性名  
詞 “ 山羊路運來的貨 ” 。語法規則如上：將詞首的二級元音 a 變為  
三級元音 ā，同時在詞尾加上名詞後綴 ika ] 。

“ 通過楔子路行走 ” 可構成 śāṅkupathikaḥ [ 譯者注：陽性名詞 “ 走  
楔子路的人 ” 。語法規則如上：將詞首的二級元音 a 變為三級元音 ā，  
同時在詞尾加上名詞後綴 ika ] ；

“ 通過楔子路運來的貨 ” 可構成 śāṅkupathikam [ 譯者注：中性  
名詞 “ 楔子路運來的貨 ” 。語法規則如上：將詞首的二級元音 a 變  
為三級元音 ā，同時在詞尾加上名詞後綴 ika ] 。

一般來說，語法家在編例句時不會選用冷僻的字，因為用來解  
釋語法條例的詞彙大部分來源於生活中的常用詞。所以我們可以判  
斷，像 śāṅkupatha “ 楔子路 ” 這樣的詞在古代印度屬於司空見慣的  
範疇，尤其在北天竺的山區。弄清這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達麗川的  
地貌與語言之間的關係。

#### ( 四 ) 印度巴爾胡特大佛塔上的一塊浮雕

研究早期佛教的歷史不可忽略古印度的考古發現、金石學 ( 碑

銘)、以及藝術史,這樣纔有可能把文字資料與圖像資料對接起來。中印度 Bhārhut 大佛塔的四周建有雕刻精美的圍欄,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 3-2 世紀。其中一塊浮雕(見



巴爾胡特線圖

插圖)展示著兩位男子,他們每人手裡拿著四根楔子在攀登岩壁。二人的腳下還各踩著楔子,即玄奘所謂“椽杙躡蹬”(見第五節)。曇無竭傳的描述“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攀”(見第三節)準確地描寫了這塊浮雕。兩個男子身著樹葉做的“衣裳”,他們應該是山林居民 Śabara 族人。二個“走楔子路的人”śāṅkupathikah 各自背著一隻籃子,裡面的貨物就是帕曇伽利在《大疏》裡講的 śāṅkupathikam “通過楔子路運來的貨”。

### 三、曇無竭(法勇)使用的“杙”

法顯回歸漢土後於 414 年寫出《佛國記》,該書立即震驚四眾。時隔僅六年,曇無竭(法勇)“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慨然之餘立下“忘身之誓”,於宋永初元年(420 年),與同志沙門二十五人結伴啟程,重蹈法顯大師求法歷程。曇無竭與法顯的天竺之旅僅隔二十一年。他的梵文法名曇無竭(Dharmodgata 或 Dharmakṣama)是在天竺受大戒時,由禪師佛馱多羅(Buddhabhadra)所授。

在《高僧傳》裡,慧皎(約 497-554 年)把法顯傳和曇無竭傳一先一後地排列在一起。<sup>21</sup> 綜觀目前流傳下來的資料,與僧祐的《出

<sup>21</sup> 《高僧傳》卷三,《大正藏》第 2059 號,第 50 冊,第 337 頁中欄第 9 行至第 12 行:“高僧傳卷第三。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譯經下。釋法顯一。

三藏記集》<sup>22</sup>、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sup>23</sup>、以及南宋志磐的《佛祖統紀》<sup>24</sup>等相比較，慧皎所著的釋曇無竭傳內容最為詳實，雖然篇幅不長，但卻為東晉時代的高僧文化提供了珍貴史料。<sup>25</sup>

釋曇無竭二。”又見同上第419頁中欄第24行至第26行：“高僧傳第三卷。譯經下十三人。宋江陵辛寺釋法顯。宋黃龍釋曇無竭。”

<sup>22</sup>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2145號，第55冊，第12頁上欄第28行至中欄第2行：“觀世音授記經一卷。右一部，凡一卷。宋武帝時，黃龍國沙門曇無竭。遊西域譯出。”

<sup>23</sup> 《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藏》第2034號，第49冊，第92頁下欄第12行至下欄第19行：“觀世音菩薩受記經一卷，第二出，與晉世竺法護譯者小異。外國傳五卷，竭自遊西域事。右二部合六卷。武帝世永初元年，黃龍國沙門曇無竭，宋言法勇，招集同志釋僧猛等二十五人，共遊西域二十餘年。自外並化，唯竭隻還於罽賓國，寫得前件梵本經來。元嘉末年達於江左，即於揚都自宣譯出。見王宋僧祐慧皎李廓法上等錄。白著行記五卷。”

<sup>24</sup> 《佛祖統紀》卷三十六，《大正藏》第2035號，第49冊，第344頁上欄第13行至第15行：“黃龍國沙門曇無竭，與僧猛等二十五人，往西天求經越二十年。唯無竭還揚都譯經。”

<sup>25</sup> 全文見《高僧傳》卷三，《大正藏》第2059號，第50冊第338頁中欄第26行至第339頁上欄第2行：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也。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齋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為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杖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杖，先拔下杖，手攀上杖，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曰。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木舫。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土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齋石蜜為糧。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齋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

曇無竭一行的初衷是嚴格遵循顯師的軌跡，所以在他們“登葱嶺、度雪山”之後，自然也來到必須穿越的“楔子路” śaṅkupatha。曇無竭用中文的“杙”來稱謂梵文的 śaṅku，可以說恰到好處。“杙”指小木樁、短木棍，其一頭被削為尖型，所以形狀與梵文的 śaṅku 非常接近，是即形象又準確的詮釋。<sup>26</sup>

曇無竭描述了攀岩人是如何使用“杙”的：每個人手裡拿著四個杙，先把下面一根杙拔下來，用手把它插入前人鋪設好的杙孔裡，由此步步維艱地攀岩：

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sup>27</sup>

如果我們再對照一下巴爾胡特佛塔上的那塊浮雕（見第二節第四小節），其描繪的場景與曇無竭的所述顯然同出一轍。不僅如此，

---

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迹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

<sup>26</sup> 到了五世紀初，攀岩使用的“杙”有可能是金屬製造的，如《本生鬘》講到的“鐵楔子”或曰“鐵杙”（見第四節）。但相比木質的，四個鐵質楔子的自身重量不可低估。值得注意的是，七世紀玄奘使用的“杙”和“椽杙”亦均有木字旁。

<sup>27</sup> 參見 Robert Shih 的法文翻譯，Robert Shih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iographies des Moines Éminents (Kao Seng Tchouan) de Houei-Kaio*, Leuven: Institut orientaliste,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1968, p. 117:

Ils eurent encore à traverser le grand mont de Neige. Les flancs se dressent à pic et les pieds de l'homme n'y trouvent pas de prises solides. Aussi sur les parois du rocher, on a our, por (y enforcer) des crampons en bois, de trous our spu symétriquement. Chaque homme est muni de quatre crampons; d'abord il retire un crampon inférieur en se tenant de la main d'un crampon supérieur, puis l'autre, et ainsi de suite. Il fallut trois our spur frachier ce passage. Parvenues en terrain plat, les pèlerins s'attendirent les uns les autres et se dénombrèrent: doze d'entre eux avaient péri.

上述攀岩的描寫還可以逐字應對《本生鬘》中的詩句（見第四節）。尤其珍貴的是，曇無竭傳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佛國記》中的若干細節（見第二節第一小節）：

之所以需要“楔子路”的緣由，法顯和曇無竭的說法是一致的：在懸崖峭壁之間根本找不到落腳之處。法顯說：“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曇無竭說：“懸崖壁立，無安足處”。

二位西行者都說，“楔子路”是由前人施設好的。所指應是北天竺當地人。法顯說：“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曇無竭說：“石壁皆有故杙孔”。

這段艱險的“楔子路”並不短，法顯強調說“凡度七百”。可以想象，舉步維艱攀登七百個“傍梯”是需要時間的。曇無竭說“經日方過及到平地”，從時間的角度上補充了《佛國記》。法顯提供了傍梯的總數量，而曇無竭記錄了穿越所需的時間，二者呈互補關係。<sup>28</sup>

<sup>28</sup> 1987年，在實地勘察過達麗川後，海德堡大學研究印度河上游地區的民俗學家 Karl Jettmar 專門就“懸度”撰文“The ‘Suspended Crossing’: Where and Why?”（收入 *India and the Ancient World: Prof. P.H.L. Eggermont Jubilee Volume presente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edited by G. Pollet, p. 99, Leuven: Departement Oriëntalistiek, 1987）其中的描述從距離上看符合法顯說的“凡度七百”以及曇無竭說“經日方過及到平地”：

Diplomatic missions, merchants, and Buddhist pilgrims had the option to choose a time-saving but dangerous way to shorten the process. They could use the only permanent ope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nshimalayan zone and the south, namely the Suspended Crossing. ... When this footpath was used by peddlers coming from the north, they had to leave the bank of the Indus between Shatial and Sazin and climb up to a place near the village of Sazin, approximately 300 meters higher than the bottom of the Indus valley. There a group of stone slab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st dangerous part of the track. It was practicable only because tree branches had been fixed in

法顯和慧景、道整和慧應四人在這裡沒有人員損失，他們一行是否得到當地居民的協助，不得而知。但是曇無竭等二十五人在此犧牲慘重，將近折半：“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

慧皎在《高僧傳》裡雖然沒有提到法顯的“傍梯”一詞，而是採用了曇無竭比較易懂的“杙”，但顯而易見的是，慧皎在此把法顯與曇無竭相提並論，他說：

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旅成群，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sup>29</sup>

#### 四、《本生鬘》描寫善財使用 śaṅku 攀岩的詩句

五世紀初，與法顯和曇無竭同時代的梵語詩人哈利巴陀（Haribhaṭṭa）藉《本生鬘》為題撰寫了佛祖生平。這位生於北天竺罽賓國的詩人描述了善財王子如何使用“杙”攀登岩壁。這段梵文詩歌字字應對曇無竭的描述：

tatra bhūbhṛty ayaḥśaṅkum mudgareṇa garīyasā  
 kiṣkumātre sthīrikartum ājaghāna punaḥ punaḥ.  
 taṃ ca kīlakam āruhya sa jaghānāparam punaḥ

---

fissures on the rock supporting galleries, steps had been carved out, in many places there were logs with notches to be used as ladders”.

<sup>29</sup> 《高僧傳》卷三，《大正藏》第 2059 號，第 50 冊，第 346 頁上欄第 10 行至第 15 行。

sthitvā tatra ca tam kīlam adhistād udapāṭayat.

[中譯文]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大鐵錘敲打一根鐵楔子，為了把它敲進岩壁一尺深。踩到這根鐵楔子上後，他又將第二根楔子打入（岩壁）。然後他登到這根楔子上，拔出下面的（第一根）楔子。

直到上世紀 40 年代，用楔子登山並在岩壁上鑿楔子孔仍被當地人實踐著，A. Stein 在親臨此地勘察過後的描述與五世紀的曇無竭和哈利巴陀同出一轍：

“When this was being made the men had often to be suspended from pegs while they were at work boring holes to blast the rock or to fix in fissures the tree branches which were to support galleries.”<sup>30</sup>

## 五、《大唐西域記》流傳的“椽杙”和“傍杙”

在《大唐西域記》第三卷裡，玄奘一共介紹了八個國家。其中第一個是烏仗那國，也就是《佛國記》所說的“烏菴國”。他在這裡如下描述了令所有“行者望風謝路”的那條山道：

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覆絙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躑。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sup>31</sup>

<sup>30</sup> Marc Aurel Stein, “From Swat to the Gorges of the Indu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00.2 (1942): 55.

<sup>31</sup> 《大唐西域記》卷三，《大正藏》第 2087 號，第 51 冊，第 884 頁中欄第 6

### （一）“椽杙”還是“椽杙”

這段文字中的關鍵詞是“椽杙”。“杙”的含義我們上面分析《高僧傳·釋曇無竭》時已經討論過了（第三節）。這裡需要關注的是“椽”（chuán）字，它的基本意思是“木條”。在1985年出版的《大唐西域記校註》裡，季羨林等學者指出，大部分的版本在此處不讀“椽”，而是讀“椽”（zhuó），比如《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隨函錄》以及向達的校本。儘管如此，負責印度部分的蔣忠新還是根據《慧琳音義》選擇了“椽杙”，理由是“按椽字義不合，‘椽杙躡躑’，正狀棧道架木之險”<sup>32</sup>。這個讀法的選擇與上面引用的《大正藏》相同。但是，由兩個並列名詞組成的複合詞“椽杙”祇能被理解成“木條楔子”，無論在詞義上還是從句法角度看，都與後面的兩個動詞“躡躑”不搭配。

根據以上各種考證（第二節至第四節）筆者認為，“椽杙”纔是此處正確的讀法。“椽”的本意是“捶打”、“敲擊”，在“杙”之前作為動詞使用，意為將杙打入岩壁。而“躡”的意思是“踩”、“踏”。“椽杙躡躑”正是曇無竭、詩人哈利巴陀、以及巴爾胡特浮雕描述的攀岩畫面：把杙敲進岩壁後踩在上面攀登。

還需要指出的是，“椽杙躡躑”不是對“棧道”的描述，而是另外一種攀岩手段。棧道一詞早在漢代就出現在《戰國策》和《史記》等著作中，是用木板在岩壁一側平鋪的通道，雖然狹窄而且也懸空，但行人尚可踩在木板上平行。所以棧道的結構與“椽杙”攀岩差別甚遠，二者屬於不同的攀登手段，實際應用中有可能需要交

---

行至第9行。

<sup>32</sup> 《大唐西域記校註》，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96頁，註3。

替使用。如果法顯、曇無竭和玄奘等求法高僧看到的僅僅是棧道，他們完全可以使用中國早已存在的術語，而不必煞費苦心地用“傍梯”和“杙”來描繪。<sup>33</sup>在《釋迦方誌》裡，道宣也將“棧梁”與“鎖杙”理解為互補技巧：“逆上信渡河，途路極險。乘緬棧梁、鎖杙躡躑。千有餘里至達麗羅川，烏仗那舊所都也”<sup>34</sup>。道宣說的“鎖杙”就是把杙打入杙孔裡面鎖住扣牢之意。

## (二) 外道苦行者的“傍杙”

在《大唐西域記》第五卷裡，玄奘還使用了“傍杙”一詞（緊靠在柱子上的楔子），它與法顯說的“傍梯”在字面上更為接近。該卷一共介紹了六個國家，其中第四國是鉢邏耶伽國，梵文叫 Prayāga，意為“祭祀之地”。玄奘在這裡看到一種高難度的苦行方式：外道修行者數十人，日出前便在河裡升起一根高柱，用一手一足執握柱端，踩在一根“傍杙”上。而另外一手一腳則懸空伸向外方。睜開的眼睛盯著日光，頭頸隨著太陽的移動而右轉，直到日落。

“當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

<sup>33</sup> 當然，在找到梵文術語 śaṅkupatha 之前，僅憑中文史料很難準確地揣摩出高僧們的所見所聞。日本學者長澤和俊 (Nagasawa Kazutoshi, 1928-2019) 在 1996 年發表的《法顯傳註解說》裡，也曾試圖用尼泊爾的棧道圖片來詮釋“傍梯”；見 Hu-von Hinüber, “Faxian’s (342-423) Perception of India” (前揭), p. 225 n. 8, p. 230 n. 25。恩師季羨林先生 (1911-2009) 和蔣忠新先生 (1942-2002) 校勘《大唐西域記》時正值改革開放初年，參考資料相當匱乏，當時沒有採納向達先生 (1900-1966) 的觀點也不足為奇：研究和考證往往需要幾代學人的前赴後繼，哪怕祇是一字之差。

<sup>34</sup> 《釋迦方志》卷一，《大正藏》第 2088 號，第 51 冊，第 955 頁下欄第 4 行至第 6 行。

一手一足虛懸外申。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曠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sup>35</sup>

玄奘在這裡使用的“躡傍杙”，其動詞“躡”與上述的“椽杙躡躑”一致，而“傍杙”一詞使我們更有道理把法顯的“傍梯”與“杙”等同起來。這種苦行的難度除了對體力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精力的高度集中，和“椽杙躡躑”一樣，稍不留意就會跌落下來。此類苦行雖然並不被佛教推崇，但面對尋求解脫的恆心以及數十年而不息的毅力，玄奘也流露出欽佩之歎。

## 六、結語：《佛國記》研究的深入與進展

《佛國記》的篇幅雖然並非那麼浩瀚，但裡面蘊藏著大量“一帶一路”的歷史資料。本文僅僅探討了其中的兩個字“傍梯”，加上曇無竭傳的“杙”以及《大唐西域記》的“椽杙”不過四個字而已。但是通過對它們的深究，我們不僅找到了梵文 *śāṅkupatha* 最早的漢釋，破解了巴爾胡特浮雕的圖像，同時也讀懂了哈利巴陀《本生鬘》裡那句令人費解的詩文。

從漢代的蔡愔到東晉的法顯和曇無竭，再從盛唐的玄奘延續到宋朝，縱觀公元一世紀以下的千年歷史，無以計數的求法高僧征服了達麗川那條“難於上青天”的懸度。他們當中有多少勇士使用過“傍梯”和“杙”攀岩走壁已經難以準確還原，因為流傳下來的資料畢

<sup>35</sup> 《大唐西域記》卷五，《大正藏》第2087號，第51冊，第897頁下欄第19行至第27行。

竟有限。但即便是對僅存的史料來說，我們的研究也還是遠遠不夠的。相比上座部佛教和藏傳佛教，中文大藏經裡保存了大量獨一無二的史料，尤其《史傳部》是其它文獻系統中都沒有的。在佛學國際化的今天，漢傳佛教的諸多珍貴遺產需要我們更多地使用跨學科的視角深入研究。僅以《佛國記》為例，尚待解釋的問題比比皆是，拙文權當為此提供一個小小的範例而已。今年恰值季羨林先生仙逝十週年，恩師每每教誨要抓住一個問題不放，敝人謹以此篇“小題大做”的拙文紀念先生的治學精神，望與同仁共勉。

繼 2010 和 2011 年的兩篇法顯論文之後，筆者又用三篇文章討論了《佛國記》跋文的作者（2013 年）、法顯的南海歸途和護航觀音（2015 年）、以及求法高僧的心裡極限挑戰（2016 年）等問題。以上五篇用德文和英文撰寫的論文均由臺灣許尤娜博士陸續翻譯成中文，刊登於《圓光佛學學報》23、27 和 28 期。2017 年，承蒙圓光佛學研究所的加持，上述五篇拙文和中譯得以編輯成《法顯論文集雙語版》印刷<sup>36</sup>。在其尚未發表的博士論文裡，許尤娜於 2018 年全面採集了法顯研究的著述，襄垣會議論文集決定將她的文獻目錄收納在冊以助流通，為此謹向本書編輯表示衷心的謝意。筆者也由衷地感謝中山大學的楊玉昌教授和柏林自由大學的 Harry Falk 教授<sup>37</sup>，他們對曇無竭傳的關注對本文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sup>36</sup> 參見許尤娜《求法高僧法顯及其〈佛國記〉研究——宗教志向、文學感性與文化選擇》，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 年，第 192-194 頁。

<sup>37</sup> 亦參見 Harry Falk, “The Five Yabghus of the Yuezh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8 (2014; published in 2018): 28-32.

## 參考文獻

### 原始文獻

-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三卷，慧立（615–665+）撰、彥棕（鼎盛於643–649）箋，《大正藏》第2053號，第50冊。
-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602–664）、辯機（?–649）著，《大正藏》第2087號，第51冊。
- 《大唐西域記校註》，玄奘（602–664）、辯機（?–649）著，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僧祐（445–518）著，《大正藏》第2145號，第55冊。
- 《佛祖統紀》五十四卷，志磐（南宋）著，《大正藏》第2035號，第49冊。
- 《洛陽伽藍記》五卷，楊銜之（鼎盛於547）著，《大正藏》第2092號，第51冊。
- 《高僧法顯傳》一卷，法顯（338–423）著，《大正藏》第2085號，第51冊。
- 《高僧傳》十四卷，慧皎（497–554）撰，《大正藏》第2059號，第50冊。
- 《漢書》一百二十卷，班固（32–92）著，香港：中華書局，1970年。
- 《廣弘明集》三十卷，道宣（596–667）著，《大正藏》第2103號，第52冊。
- 《歷代三寶紀》十五卷，費長房（鼎盛於572–578）著，《大正藏》第2034號，第49冊。
- 《釋迦方志》二卷，道宣（596–667）著，《大正藏》第2088號，第51冊。

## 東亞語研究

金克木《梵語語法〈波你尼經〉概述》，收於金克木著《梵佛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9頁。

胡海燕著、許尤娜譯《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臺北：圓光佛學研究所，2017年。

許尤娜《求法高僧法顯及其〈佛國記〉研究——宗教志向、文學感性與文化選擇》，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年。

## 西文研究

Böhtlingk, Otto. *Pāṇini's Grammatik: herausgegeben, übersetzt, erläutert und mit verschiedenen Indices versehen*. Leipzig: H. Haessel, 1887.

Falk, Harry. "The Five Yabghus of the Yuezh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8 (2014): 1-43.

Hulsewé, A. F. P. and M. A. N. Loewe. 1979.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 23*. Leiden: E.J. Brill.

Hu-von Hinüber, Haiyan. "Faxian's (342-423) Perception of India—Some 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 *Foguoji*."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0*, vol. XI (2011): 223-247.

Jettmar, Karl. "The 'Suspended Crossing': Where and Why?" In *India and the Ancient World: Prof. P.H.L. Eggermont Jubilee Volume presente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edited by G. Pollet, 95-102. Leuven: Departement Oriëntalistiek, 1987.

Meister, Michael W., and Olivieri, Luca M., "Gumbat Balo-Kale (Swat):

Architectural Analysis, Conservation, and Excavation (2011-2012)”,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and Art 2012*, vol. 2 (2015): 553-566.

Neelis, Jason, *Early Buddhist Transmission and Trade Networks. Mobility and Exchange within and beyond the Northwestern Borderland of South Asia*, Leiden (Brill) 2011.

Shih, Robert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iographies des Moines Éminents (Kao Seng Tchouan) de Houei-Kaio*. Leuven: Institut orientaliste,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1968.

Stein, Marc Aurel. “From Swat to the Gorges of the Indu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00 (2), 1942: 49-56.

